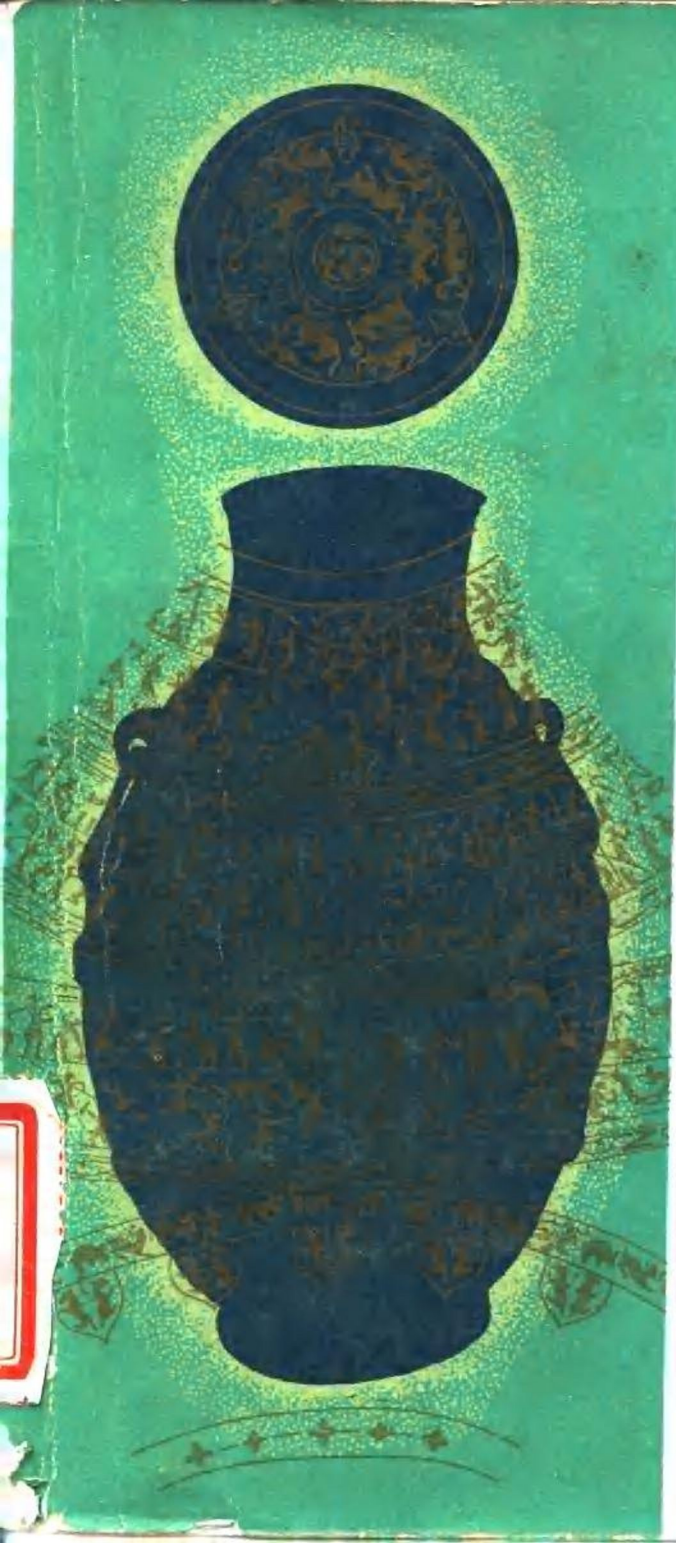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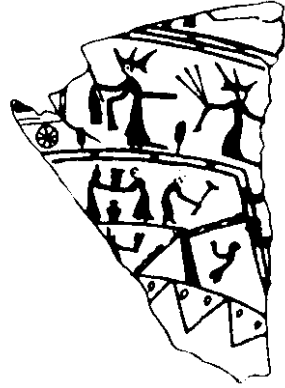
# 中国青铜时代

张光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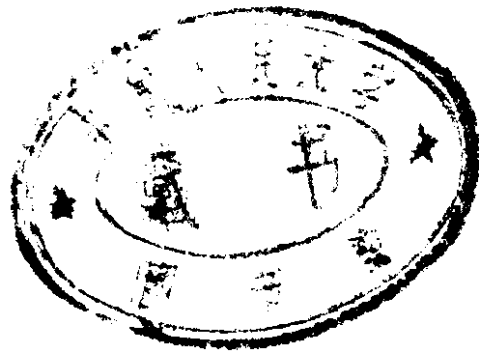
11.122-2/3

1093999



# 中国青铜时代

张光直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书店

封面设计：马少展

**中 国 青 铜 时 代**

Zhongguo Qingtong Shidai

张 光 直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出版**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香港分店：域多利皇后街9号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1印张 239,000字

1983年9月第1版 1983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6,500

书号 11002·607 定价 1.45元

## 出 版 说 明

作者张光直先生，现任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兼系主任。这本由作者自己编定的论文集，运用考古材料对夏商周三代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研究。本书对于进一步探索三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特征及科技的发展，有学术上的参考价值。

## 前 言

近年来不但中外学者对中国古代青铜器的兴趣跟着青铜器与青铜时代文化遗址遗物的新的考古发现的增加而逐渐提高，便是一般对文史学术稍有兴趣的人也对青铜时代的特征与来龙去脉增加了很大的好奇心。随着这些兴趣与好奇心而来的需要是关于青铜器与青铜时代的读物。在这方面的专业书籍文章虽然很多，对中国青铜时代的文化社会与美术特征，根据较新的资料作比较一般性的讨论的中文书却还少见。这本书便是为了适应这样的一个需要而编印的。

过去以“青铜时代”或“青铜器时代”作题目的书恐怕以郭沫若在抗日战争胜利一年在重庆所出的一本最为人所熟知的了，可是这本书的内容主要是讲古代的学术思想的。真正讲青铜器与青铜文化的必修书是容庚的《商周彝器通考》（北京哈佛燕京学社《燕京学报》专刊第十七号，1941年）与郭宝钧的《中国青铜器时代》（北京，三联书店，1963年）。前者是叙述与讨论中国古代青铜礼器最详尽最深入的一本书；虽然出版四十年来青铜礼器的新资料增加了很多，而且研究内容也有突进，可是象容书这样大规模的综合著作，迄今还没有第二本。郭书采用了许多新的考古材料，把考古与文献史料揉合在一起，对青铜时代的生活情况从各方面作了一个比较综合性的叙述。想真正深入研究中国青铜时代的读者不妨从这两本书入手。

这本书的目的既不是讨论铜器本身，也不是对青铜时代文化的综合叙述。它的主要目的是对中国青铜时代文化与社会的若干主要特征作整体性的讨论。我相信青铜时代的社会与文化的各方面的成分、因素与特征，是彼此之间作有机性的联系的，而且它们之间的联系不是固定性的，机械性的，而是经常变动的，而且分层分级的。研究青铜时代的每一方面，小自一件器物或它上面的纹饰，大到整个的中国政制，都得从两方面同时着手：一是它本身的性质，二是它与其他方面的关系。本书所选的论文的主要讨论对象，包括城市、王制、经济、贸易、饮食、神话、美术，以及青铜器本身和它上面的装饰纹样。我们讨论它们的个别的特征，也讨论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

从这些方面的初步研究，我们已经看出许多中国古史上的新问题来了。因为这书是讨论青铜时代的，我们便举一些直接有关的问题：中国古代的三代从技术史上看是青铜时代，这是个事实。但是，为什么青铜器在这个时期出现？出现以后对中国文化社会史的发展进化上起了什么样的作用？青铜时代社会的特征在中国历史上占着什么样的地位？与世界其他地区古代文明比较起来有何同异？所谓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法则在中国的史实中，至少在青铜时代的史实中，是不是得到进一步的证实？中国青铜时代史实所表现的因果关系对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法则有什么新颖的贡献？这些都是相当大的基本性的问题，我们只求把它们提出来便行了，至于它们的解决，乃是后事，但希望本书的讨论在有些方面有少许启发的作用。

本书的另外的一个目的是想试试看能不能用一些具体的例子来证明中国古代的研究不是“专业”而是“通业”。所谓“本行”的观念我觉得害人不浅。深入研究任何一种事物、现象，都需要长

期深入的训练,这是不错的,但现在所谓“行”,其区分的标准常常只是历史的偶然传统,并没有现实的理由。“中国古史”这个题目常常依照史料的性质而分为专业:有人专搞古文字,有人专搞历史,有人专搞美术,有人专搞考古。搞古文字的人还分甲骨文、金文。这样一来,中国古史搞得四分五裂,当时文化社会各方面之间的有机联系便不容易看出来。这里所收的文章便代表一种以历史为主以专业为从的基本人手方式。但我自己也是旧传统训练出来的“专业人才”,在许多方面的了解是不够深入的,因此,这里的有些讨论很可能有各方面的错误,但这是旧训练方式的错,是我的错,不是“通业”这个目标的错。实际上要搞通业,我们个人在一般知识的训练上还差得太远。讲通业讲到底,我们还得把中国的材料与中国的研究成果与世界其他各地的情形作比较,因为中国的情形只是全世界人类千变万化的各种情形之一,不了解世界的变局便不能了解中国的常局。例如讨论商周王制与动物图像时我们都很清楚地看到了比较社会学与民族学在中国古史上的重要性。但可做比较研究之处还多如沧海。讲中国学问没有中国训练讲不深入,但讲中国学问没有世界眼光也如坐井观天,永远讲不开敞,也就讲不彻底。

本书如果有一些这一类的特点,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工作在外国多年,而且以人类学为专业。人类学是重比较的,而从外国看中国学问也比较易于实事求是而少为中国习见所囿。至于是不是有可取之处,可以为容、郭两书以及这一类比较老老实实的书文作一些有用的补充工作呢,则全看读者的判断了。

这里所收的论文都是已经发表过了的;最早的一篇刊于1962年,最近的在1981年,其余的则散在这二十年之间。这次把它们收集在一起,好好的阅读整理了一下,却相当惊讶的发现,我在对

中国青铜时代较重大的问题上的看法,在这二十年间虽有增进,却无基本上的改变。其中有几篇原来是用英文写的,这次为了本书的刊印,特别将它们译成中文。英文写的文章有它的对象,有它的一定写法,翻成中文之后,颇觉佶屈聱牙,而且结构选材都有不适之感,但为了保存原样,所以改动甚少。

1981年2月23日写于美国麻省剑桥



# 目 次

前 言 .....	1
中国青铜时代 .....	1
从夏商周三代考古论三代关系与中国 古代国家的形成 .....	27
一、文字史料中的三代关系 .....	28
二、三代关系的考古资料 .....	34
三、从三代考古看国家形成程序 .....	46
殷商文明起源研究上的一个关键问题 .....	57
殷周关系的再检讨 .....	81
一、前言 .....	81
二、旧史料中所见殷周关系 .....	83
三、考古遗物中所见殷周关系 .....	92
四、殷墟卜辞中所见殷周关系 .....	97
五、岐山甲文中所见殷周关系 .....	100
六、小结 .....	105
中国考古学上的聚落形态——一个青铜 时代的例子 .....	107
一、中国青铜时代的城邑 .....	108
二、城邑间的分级制度及其变化 .....	111
三、理论上的一些意义 .....	117

古代贸易研究是经济学还是生态学? .....	122
商王庙号新考 .....	135
一、商王庙号的意义 .....	135
二、从商王庙号所见的王室亲属婚姻制度 .....	145
三、与商王庙号有关的若干其他史实 .....	160
谈王亥与伊尹的祭日并再论殷商王制 .....	172
一、王亥和伊尹祭日材料 .....	172
二、商人何以以十日为名? .....	179
三、再论殷商王制 .....	185
四、再看伊尹和王亥 .....	193
殷礼中的二分现象 .....	197
一、从小屯与西北冈说起 .....	197
二、殷王世系中的昭穆制 .....	200
三、卜辞中的“新派”与“旧派” .....	208
四、殷铜器装饰美术的两派 .....	210
五、结语 .....	218
✓ 中国古代的饮食与饮食具 .....	220
✓ 商周神话之分类 .....	251
导言 .....	251
一、自然神话 .....	263
二、神仙世界及其与人间世界分裂的神话 .....	268
三、天灾与救世的神话 .....	271
四、英雄世系 .....	275
商周神话与美术中所见人与动物关系之演变 .....	288
导言 .....	288
一、人对于动物态度之转变 .....	291
二、商周亲族群之若干特征 .....	296

三、商周王权历史与人、祖、神诸观念之变迁 .....	303
四、动物所扮演的角色 .....	310
商周青铜器上的动物纹样 .....	313
一、商周铜器装饰花纹中的动物纹样 .....	314
二、动物纹样的意义 .....	319
三、动物纹样其他若干特征的讨论 .....	332

# 中国青铜时代\*

新中国建国三十年以来,在考古学上有了很大的进展,但是我们可以说在这门学科里到目前为止,最为重大的收获是在中国文明形成阶段上的新的知识,也就是中国青铜时代的新知识。其他的考古新发现有的更为壮观,如秦俑坑的兵马俑;又有些发现在文化的个别方面的研究上有了更大的影响,如云梦出土的秦律和长沙出土的帛书。可是这些发现仅只在我们对中国历史既有的知识上有所增益,而青铜时代的考古则将我们对中国历史的了解造成了基本性的改变。我们甚至可以说在三十年以前我们还不知道中国的历史是如何开始的,可是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或至少已经开始知道了。这个新知识是从过去三十年来自中国青铜时代中许多大大小小考古发现的积累而来的。

我们所谓中国青铜时代,是指青铜器在考古记录中有显著的重要性的时期而言的。辨识那“显著的重要性”的根据,是我们所发现器物的种类和数量,使我们对青铜器的制作和使用在中国人

---

\* 这篇论文本来是1979年3月7日在耶鲁大学东亚研究评议会主持的休谟(Hume)纪念讲演会上的讲稿。原为英文“The Chinese Bronze Age: A Modern Synthesis”,载“The Great Bronze Age of China”, Wen Fong ed., New York: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1980, pp. 35—50。本题过去的综合性的论文和书有郭沫若:《青铜时代》(重庆,1945年);郭宝钧:《中国青铜器时代》,北京,1963年;Li Chi, “The Bronze Age of China”, in: *The Beginning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Seattle, 1957), pp. 39—59。

的生活里占有中心地位这件事实,不容置疑。金属器物(包括青铜器物)的初现远在青铜时代的开始以前,但到了二里头文化的时代,青铜器的显著重要性成为不疑的事实,而现在大家相信中国青铜时代的开始不会迟于公元前二千年。它的结束则是一个冗长而且逐渐的程序,开始于春秋时代的晚期,但直到公元前三世纪的秦代才告完成。如此,则依照目前的考古纪录看来,中国青铜时代持续了至少有一千五百年之久,虽然在它的晚期它与铁器时代有好几百年的重叠。

不论我们用不用“青铜时代”这个名词来指称公元前二千年到五百年这段时期,这一段时期的确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有人称之为奴隶社会,<sup>①</sup>有人称之为中国文明的形成期。<sup>②</sup>如果中国历史上青铜器有显著重要性的这个阶段与用其他标准来划定的某个阶段相合,那么青铜器便有作为文化与社会界说的标准的资格。

在西方,“青铜时代”这个名词最初是丹麦国家博物馆保管员克·吉·汤姆森(Christian Jurgensen Thomsen, 1788—1865)所创用的,是代表该馆收藏品的一个新的分类的三大时代(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的第二个。照汤姆森所著《北方古物指南》(Ledetraad til Nordisk Oldkyndighed, 哥本哈根, 1836年)中的定义,“青铜时代”乃是“以红铜或青铜制成武器和切割器具”的时代。<sup>③</sup>在他的1944年度赫胥黎纪念讲演时,戈登·柴尔德(V. Gordon Childe)将考古学上的三大时代解释为“在技术的发

---

① 郭沫若:《奴隶制时代》,北京,1972年。

② Kwang-chih Chang, *Early Chinese Civilization* (Cambridge 1976).

③ Glyn Daniel, *The Origins and Growth of archaeology* (Baltimore 1967), p. 94 所引。

展、生产力的进化上的一串的相连续的阶段”。<sup>①</sup> 柴尔德进一步将青铜时代分为三段“方式” (modes)。在第一个方式中，兵器和装饰品有用红铜和青铜的合金制作的，但当时还没有“突变”而来的工具，而且专用于工业的器具甚少。石制工具仍旧很仔细的制作。在第二期方式中，红铜和青铜在手工业中经常使用，但不用于农畜活动，也不用于粗重作业。金属物的类型包括刀、锯和专门化的斧、铤和凿子。第三期的方式则以金属器具引进于农业及用于繁重劳动为特征，这在考古纪录上表现为金属镰刀、锄头、甚至于锤头。柴尔德很谨慎的说明了这些方式在所有地区未必都照这个顺序出现，但（他很强烈的暗示了青铜器具之采用，其重要意义主要在生产领域之内。）在《青铜时代》一书里，柴尔德仍将这个名词界说如次：“金属——其实红铜比红铜与锡的合金更常见——最初经常使用为主要的切割工具和兵器，以代替或补充较早的石、骨和木制装备的一个工艺的阶段”<sup>②</sup>。但是他又补充说：“青铜时代的意义远远超过一个工艺的阶段”，他认为这种金属的制作和使用是和一连串的作为这个新的技术阶段的原因或其结果的一些彼此相关的变化有所联系的。这些变化包括：较有效率的生产工具与兵器，尤其是适用于车轮的制作的金属锯子等的出现；熔矿和采矿的应用科学；牵涉到赤铜和其他金属矿石的有组织的国际贸易的肇始；以及专门技术人员的出现。这些看法都比较新颖和成熟，但柴尔德仍旧将青铜技术当作一种环绕着生产活动的工业来加以强调的。

假如如上所述，中国青铜时代之始终与依照别的标准所建立

---

① V. Gordon Childe, "Archaeological ages as technological stages",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74 (1944), pp. 1—19.

② V. Gordon Childe, "The Bronze Age", *Past and Present* 12(1957), p. 1.

的中国社会史文化史的某种阶段在基本上相符合,这当如何解释? (青铜器有什么特点可以使它作为一个划时代的象征?) 我们在这些问题上的答案,是可以将柴尔德根据近东与欧洲的资料所得的结论加强,还是可以在它们上面增加一些新的看法? 在考虑这些问题之前,我们必须先将中国青铜时代文明的若干基本现象作一番考察。

中国古代的居民可能在青铜时代开始之前,已有很久的使用金属的历史。在公元前五千年的西安半坡的仰韶文化遗址曾发现过一小片金属。<sup>①</sup> 其体积甚小,形状不明,成分亦不明。在半坡附近与它时代也相当的姜寨的仰韶文化遗址的一个房屋居住面上也曾发现过一块小金属圆片;它的成分是百分之六十五红铜,百分之二十五锌。<sup>②</sup> 这样的成分颇不寻常,因为照过去理解锌在中国合金史上发现较晚。<sup>③</sup> 但它出土的部位相信是可靠的,而且据说在山东的一个龙山文化遗址中也有过一件铜锌合金物发现。<sup>④</sup> 比较纯的红铜或红铜与其它金属(锌、锡和铅)偶然的或有意的结合,可能在中国史前史上相当早的时期,或至少在中国的陶工能在他们的陶窑里产生能够溶解含有这些金属成分的矿石的温度的时期,曾经

---

① 夏鼐:《碳十四测定年代和中国史前考古学》,《考古》1977年第4期,217—232页。

② 唐兰:《中国青铜器的起源与发展》,《故宫博物院院刊》1979年第1期,4页。

③ K. T. Chang, "The beginning of the using of zinc in China", *Bulletin of the Geological Society of China* 2(1923), nos. 1/2, pp. 17—27; *ibid.*, "New research on the beginning of using zinc in China", 4 (1925), No. 2, pp. 125—132.

④ 据夏鼐与安志敏两先生面告。

有过相当程度的使用。<sup>①</sup>(金属之使人无疑的出现,始于公元前二千年前不久,见于甘肃的齐家文化与辽宁西部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在好几个遗址里曾发现过红铜的装饰品和小件的器物。<sup>②</sup>这些个文化与黄河流域的若干龙山文化大致同时,而后者因为它若干陶器的“金属器似”的外形(尤其是柄根部的“钉形”钮,常认为是金属铆钉的陶器仿制品)而一直有人相信曾使用了金属器。<sup>③</sup>实际上,同一类的陶器在齐家文化本身(即一种确有红铜器发现的文化)中的发现,也已导致可能至少部分为锤制的金属容器已经在齐家文

---

① 李家治:《我国古代陶器和瓷器工艺发展过程的研究》,《考古》1978年第3期,179—188页;周仁等:《我国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和殷周时代制陶工艺的科学总结》,《考古学报》1964年第1期,1—27页。根据这些著作,新石器时代遗址的陶窑已能持久维持摄氏一千度或更高的温度;这个温度足够溶解多半的有关的矿石了。

至于铜和锌在这样早的时代,似不可能结合,Earle Caley关于欧洲和地中海区域早期的史前铜锌合金的偶然产例的推论,是值得注意的:“青铜在类似的程序之下,很容易能在原始器皿中从铜矿与锡矿的混合物中产生,但是黄铜不能使用这种一般制造合金的方式生产,因为高到能够分解铜矿与锌矿的程度的温度,同时也便高到在锌能以还原作用与任何铜形成合金之前,便把它几乎全部蒸发与氧化。……用渗碳法所形成的铜锌合金,似乎是史前这种合金能够生产的唯一方法。在这种方法下,……把细铜条或小铜块埋在放在坩锅里面的锌矿石和木炭的搀合物里面。当把坩锅和它的内容加热到一定的温度时,由还原作用而产生的锌有若干会蒸发而丧失,但多半会陷在铜的火热的表面上而形成铜锌合金。这以后再将这金属加以熔合并加以搀拌便会形成均匀的合金”。(*Orichalcum and Related Ancient Alloys*, New York: 1964, pp. 11—12)。这条资料承哈佛大学研究生 Linda Ellis 惠示,敬此致谢。

② 关于齐家文化的资料,见:《甘肃永靖大何庄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4年第2期,53—54页;《甘肃永靖秦魏家齐家文化遗址》,《考古学报》1975年第2期,74页、87页;《甘肃武威皇娘娘台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0年第2期,59—60页。关于夏家店文化的资料,见:《赤峰药王庙夏家店遗址试掘报告》,《考古学报》1974年第1期,127页;郑绍宗:《有关河北长城区域原始文化类型的讨论》,《考古》1962年第12期,666页;《敖汉旗大甸子遗址1974年试掘简报》,《考古》1975年第2期,99页;《河北唐山大城山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9年第3期,17—34页。

③ Liang Ssu-yung, “The Lung-shan Culture: A prehistoric phas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Proceedings of the sixth Pacific Science Congress* 4 (1939), pp. 59—79.



化中产生或作为齐家文化中若干陶器的原型的这种推论。<sup>①</sup>“红铜时代”之作为一个重要的工业阶段在中国史前时期之存在是日本学者道野鹤松鼓倡已久的一个说法，但有人认为此说的基础不甚可靠。<sup>②</sup>中国青铜时代也许有过以红铜容器以及工具为特征的一个阶段，但我们还没有充分的考古证据来对此加以严肃的讨论。

金属器物之显著的重要性的最早的证据——在有中心性的考古遗址中与贵族阶级关连的铸造的青铜礼器与兵器——发现于河南西部的二里头文化。在二里头文化(最早发现于1959年偃师县二里头村的考古遗物<sup>③</sup>而得名)中，青铜也用于小件工具与器具(如刀和锥子)以及饰物的制作。在齐家文化里红铜也用以制作斧、刀、锥子和其它器具与工具，但在齐家里没有像二里头文化那样的与青铜礼器、兵器连合的贵族地点。这个与不同种类的金属器(在一方面有工具、器物 and 饰物，在另一方面有兵器和礼器)有关连的在文化与社会水平上的差异，供给了我们了解青铜在中国青铜时代里真正的意义的第一条线索。

迄今为止，自二里头遗址发现了四件礼器，都是酒器中的爵。<sup>④</sup>四器均小型，薄(均一公厘)、素面、平底，但体上的接缝痕迹很清楚的表示它们是由至少四件块范铸成的。作为古代中国有特征性的一种技艺，块范铸铜法要经过几个步骤。首先要用粘土制

---

① Robert W. Bagley, "P'an-lung-cheng: A Shang city in Hupei", *Artibus Asiae* 39(1977), nos. 3/4, pp. 197—199.

② Noel Barnard, *Bronze Casting and Bronze Alloys in Ancient China*, *Monumenta Serica Monograph XIV* (Tokyo, 1961), p. 184.

③ 徐旭生:《1959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考古》1959年第11期,592—600页。

④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三、八区发掘简报》,《考古》1975年第5期,304页;《偃师二里头遗址新发现的铜器和玉器》,《考古》1976年第4期,260页;《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铜器和玉器》,《考古》1978年第4期,270页。